

隋唐时期的法舍利埋藏研究

刘 海 宇[※]

舍利是梵语“Śarīra”的音译，意为遗骨，佛家一般特指佛的遗骨。初唐释道世所撰《法苑珠林》卷四十云：“舍利者，西域梵语，此云身骨。恐滥凡夫死人之骨，故存梵本之名。”¹⁾ 相对于真身舍利，佛所说的经典、咒语等称法身舍利，又称全身舍利，或称法颂舍利，一般简称为法舍利。隋智顓《妙法莲华经文句》引《释论》明言：“经卷是法身舍利”。辽代庆州白塔所出碑铭称刻有经文的金板为“金法舍利”，包裹经卷的经袱上写有“法舍利”或“全身舍利”。²⁾ 法舍利既包括纸质经卷，又包含石质以及金、银、铜等质地的刻经。

佛家认为法舍利供养与真身舍利供养同等重要，但两者的供养方式却不尽相同，真身舍利的主要供养方式是瘞埋，而法身舍利的供养除瘞埋之外，还有书写、读诵等诸多方式。例如：后秦鸠摩罗什译《法华经》云：“若经卷所住处，皆应起七宝塔，极令高广严饰，不须复安舍利。所以者何？此中已有如来全身。”说的是经卷亦须建塔安置。北凉县无谶译《大集经》云：“所作供养，皆作生身、法身。生身供养者，即是塔像。法身供养者，书写读诵十二部经。”说的是法身舍利供养即是书写、读诵一切经。本文所言“埋藏”既包括瘞埋于塔基地宫，又包括安置于天宫、塔身以及石窟等其他的藏经方式。

有关古代佛家的真身舍利瘞埋制度，多有研究著作问世。³⁾ 但是隋唐时期法舍利的埋藏问题，却多不为学者所重视。本文主要根据考古所见隋唐时期的藏经遗物，兼及文献中有关藏经的记载，重点对隋唐时期的法舍利埋藏问题进行考察与研究，最后涉及东亚诸国的法舍利埋藏问题，希冀得到方家指正。

一、隋代的石窟刻经、藏经

把经书刻在石头上，始于东汉熹平四年（175），朝廷把儒家经书刻在石碑上，安置于京城洛阳的太学，其目的是为了统一版本，永久流传。至三国时代，又有正始石经问世。佛家刻经于石以北凉时期（397-439）为早，现存十余基刻有《增一阿含经》等部分经文的小型石塔，高度一般在40多厘米，大者90余厘米，主要出土于敦煌、酒泉、吐鲁番等地。造塔发愿文数见“生值末法”之语，学者认为刻经于塔是在末法思想影响下宣扬“佛法永存”的行为。⁴⁾ 亦有学者认为刻有经文的北凉石塔即是法舍利塔。⁵⁾

※ 岩手大学平泉文化研究センター

1) (唐)道世撰：《法苑珠林》，大正藏第53册，NO.2122。本文所引佛经均据《大正藏》，不再加注。
2) 德新等《内蒙古巴林右旗庆州白塔发现辽代佛教文物》，《文物》1994年12期。
3) 参见冉万里：《中国古代舍利瘞埋制度研究》，文物出版社，

2013年。

4) 参见殷光明：《北凉石塔研究》，台湾新竹觉风佛教文化艺术基金会，2000年，127-150页。

5) 李玉珉：《中国早期佛塔溯源》，《故宫学术季刊》第六卷第三期，1989年。

北朝时期开始出现摩崖刻经、石窟刻经以及刻经碑，流行于北魏晚期至北周时期（六世纪初期至晚期），多见于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地。⁶⁾特别是北齐天统四年（568）至武平三年（572）唐邕在都城邺城附近的北响堂山镌刻《维摩诘经》、《弥勒下生经》、《胜鬘经》、《字敬》等四部经书的全文，开创了刊刻经书全文的先例，具有里程碑意义，据崖壁《唐邕写经记》载，刻经目的是为了保存佛法而使之永垂不灭。河北涉县中皇山娲皇宫刻经规模比北响堂山唐邕刻经规模更为巨大，始刻于北齐天保年间（550-559），结束于北齐灭亡前夕，共刻六种经书，计十三余万字，亦或由唐邕住持刻凿。⁷⁾这些北朝刻经对隋代以及后世的刻经与藏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 隋代石窟刻经

安阳灵泉寺大住圣窟由高僧灵裕开凿于开皇九年（589），位于河南省安阳灵泉寺西山坡上，窟内外刻十余种佛经的部分经文，包括《法华经》、《胜鬘经》、《大集经》、《摩诃摩耶经》等，又刻二十四位“传法圣师”画像以及名称。灵泉寺原名宝山寺，隋开皇年间赐名灵宝，高僧灵裕在开皇十一年（591）应文帝召至京城，为帝、后授菩萨戒，被封为国家的最高僧官。此外，灵泉寺东南5公里有小南海石窟三座，均开凿于北齐天保年间（550-559），乾明元年（560）于中窟刻《华严经偈赞》与《大涅槃经·圣行品》，又刻有《方法师镂石板经记》，记载北齐著名高僧稠禅师“欲刊记金言，光流末季”，但因故不遂，禅师入寂后，其门人“镂石班经，传之不朽”。⁸⁾初唐僧人道宣所撰《续高僧传》记载，灵裕在窟内“镌法灭之相”，学者或认为隋代灵裕的大住圣窟刻经受到北齐小南海石窟刻经的影响，与北朝末年流行的末法信仰关系密切。⁹⁾

曲阳八会寺刻经龕，位于河北省曲阳县西羊平村附近少容山顶，由一块巨石雕造，四面各开一龕，共刻《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笈五》、《佛说弥勒成佛经》等五部佛经。从题记可知经龕开凿于开皇十三年（593），比灵裕的大住圣窟晚四年。曲阳是灵裕的故乡，或认为八会寺刻经与灵裕有一定关系。¹⁰⁾

北京房山万佛堂孔水洞刻经，位于喀斯特自然洞穴孔水洞内雕有佛像的佛龕之下，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现隋大业十年（614）所刻《大般涅槃经·寿命品》的部分经文。¹¹⁾

2. 隋末唐初僧人静琬的房山刻经、藏经

静琬（？-639）是隋代幽州（今北京）智泉寺的僧人，于大业年间开始在幽州北山（今房山北京）刻造佛经于石板，藏于雷音洞石窟，期间曾得到隋炀帝皇后萧氏及其同母弟萧瑀等皇亲国戚、朝野群臣的大力资助。¹²⁾据研究，静琬或是隋文帝时期最著名高僧灵裕的继承人，大业七年（611）隋炀帝帅群臣亲征高丽时，得以与萧皇后等贵族结缘，并开始准备刻经。¹³⁾大业十二年（616）四月八日的佛诞日，静琬在雷音洞凿地宫瘞埋舍利三颗，于石函刻铭云：“大隋大业十二年岁次丙子四月丁巳朔八日甲子，于此函内安置佛舍利三粒，愿住持永劫。”（图一）隋代石函出土于1981年，石函外有明代万历二十年重安时所造汉白玉函。¹⁴⁾

6) 罗炤：《中国佛教石经概述》，《石窟寺研究》第七辑，2017年，86-96页。

7) 李裕群：《邺城地区石窟与刻经》，《考古学报》1997年第4期。

8) 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河南安阳灵泉寺石窟及小南海石窟》，《文物》1988年4期。

9) 丁明夷：《北朝佛教史的重要补证——析安阳三处石窟的造像题材》，《文物》1988年4期。

10) 刘建华：《河北曲阳八会寺隋代刻经龕》，《文物》1995年5期。

11)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万佛堂孔水洞调查》，《文物》1977年1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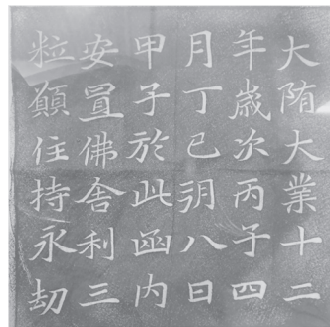
12) 唐高宗永徽年间（650-655）吏部尚书唐临所撰《冥报记》云：“幽州沙门释智苑，精练有学识。隋大业中，发心造石经藏之，以备法灭。既而于幽州北山，凿岩为石室，即磨四

壁，而以写经。又取方石，别更磨写，藏诸室内。每一室满，即以石塞门，用铁锢之。时隋炀帝幸涿郡，内史侍郎萧瑀皇后之同母弟也，性笃信佛法，以其事白后。后施绢千匹及馀钱物以助成之，瑀亦施绢五百匹。朝野闻之，争共捨施，故苑得遂其功。”学界一般认为智苑与静琬是同人异称。参中国佛教协会编：《房山云居寺石经》，文物出版社，1978年，1-18页。

13) 罗炤：《房山石经之源与静琬的传承》，《文物》2003年3期。

14)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考古集成（15）》，北京出版社，2000年，358页。笔者曾于2018年7月1日-2日赴北京首都博物馆与房山云居寺考察，照片为当时所摄。

静琬在世期间所刻石经主要有：《法华经》、《华严经》、《涅槃经》、《维摩经》、《金刚经》、《胜鬘经》、《佛遗教经》、《无量义经》、《弥勒上生经》等，建成三个藏经洞窟：第五洞雷音洞（大业十二年成）、第七洞（贞观五年成）、第八洞（贞观八年成）。¹⁵⁾ 主洞雷音洞规制模仿木构佛殿建筑，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前壁长 10.77 米，后壁长 7.66 米，南壁长 8.3 米，北壁长 11.82 米，四壁镶满刻有佛经的石板，中有四根石柱，柱上共刻 1056 尊佛像以及各自的佛名，地面中心瘞埋舍利函，无主尊造像（图二）。德国学者雷德侯认为雷音洞是寺庙大雄宝殿与佛塔的混合体。¹⁶⁾



图一 雷音洞出土隋大业二年舍利函及铭文拓本（笔者摄）



图二 雷音洞外景及洞内照片（笔者摄）

关于刻经、藏经的目的，据静琬所刻题记可知刻经是为了保护佛法，使之流传万代，后世法灭时以充经本。1989 年发现的唐武德八年（625）残碑云：“恐一朝磨灭，纸叶难固，长□此涕流悲感，琬为护正法□石经一十二部……流通万代，利益无穷”，碑阴云：“取传写迄，愿还次第安置□经本愿勿出之。”¹⁷⁾ 刻于雷音洞外左壁的贞观二年（628）题记云：“至今贞观二年□（已寢末）法七十五载……静琬为护正□率己门徒知识及好□越，就此山顶，刊华严□一十二部，冀于旷□苍生一切道俗□”，叙述在进入末法七十五年之后，为护佛法而刻《华严经》等十二部经。又，刻于贞观八年（634）的《华严经》题记亦云：“静琬敬白未来之世一切道俗：法幢将没，六趣昏冥，人无惠眼，出离难期。每寻斯事，悲恨伤心。今于此山镌凿《华严经》一部，永留石窟，劫火不焚。使千载之下，惠灯常照，万代之后，法炬恒明……此经为未来佛法难时，拟充经本。世若有经，愿勿辄开。”¹⁸⁾

静琬所凿雷音洞与以往的佛教石窟截然不同，以往的石窟多以佛像为主，间或刻写经文，而雷音洞内没有主尊造像，完全是为藏经而造，洞窟中心瘞埋佛舍利，四壁镶满石经板，四根石柱遍刻千余尊小佛像。参拜者可以在绕行石壁以及石柱时读诵经文和佛号。据前引《大集经》所讲“生身供养者，即是塔像。法身供养者，书写读诵十二部经”，雷音洞内所埋舍利与石柱佛像是生身供养，所刻石经、佛号以及绕行读诵是法身供养。雷音洞四壁所嵌石板经无疑是法身舍利，静琬在洞内集中了生身和法身两种供养。更进一步说，雷音洞作为模仿木构建筑的石窟式藏经殿，开后世在藏经阁下建造地宫瘞埋舍利之先河¹⁹⁾，也是迄今确知的法舍利埋藏之滥觞，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15) 参见气贺泽保规：《唐代房山雲居寺的發展と石經事業》，氏编《中国佛教石經の研究》，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1996年3月，44-45页。

16) (德)雷德侯著，张总译：《雷音洞》，《佛学研究》2017年1期。

17) 田福月：《石经山发现唐武德八年静琬题记残碑》，《法音》1990年2期。

18) 中国佛教协会编：《房山云居寺石经》，文物出版社，1978年，

83页。

19) 宋代藏经阁地宫已发现的有：江苏宜兴法藏寺转轮藏地宫、湖北当阳玉泉寺经藏地宫、浙江衢州开仙院转轮藏地宫、浙江义乌景德寺转轮藏地宫等。参见许夕华主编：《法相光明—江苏宜兴法藏寺北宋地宫文物》，中国书店，2015年，18-21页。

二、唐代的法舍利埋藏

唐代继承隋代在石头上刻经与石窟藏经的同时，又出现了在塔内的天宫和地宫埋藏经书作为法舍利的事例，亦有墓葬中墓主佩带经书的情况。

1. 唐代的房山刻经与藏经

静琬于贞观十三年（639）入寂之后，其弟子玄导继承先师遗志继续刻经和藏经，其后武则天时期由僧仪继续住持刻经。至开元、天宝年间（八世纪前半叶），惠暹和玄法住持刻造佛经，得到玄宗第八妹金仙公主的大力施助，房山石经雕造事业进入全盛时期。由于原来洞窟均已藏满石经，又新凿第一洞与第二洞两个洞窟。至晚唐时期的贞元、元和年间（八世纪末至九世纪初），僧人真性得到幽州节度使的施助，又刊刻不少石经。唐代的房山刻经与藏经是对静琬事业的继承和发展，其性质亦应与法舍利的供养与埋藏有关。

2. 山东金乡县光善寺塔出土法舍利²⁰⁾

据出土造像铭文材料，金乡县光善寺建于北魏太安年间（455-459）之前，又据地方志记载，佛塔建于唐贞观四年（630）。光善寺塔，砖石结构，八角九层，第三层佛造像铭云“大唐开元岁次丙辰丁未朔寅建造”，查《二十史朔闰表》²¹⁾，可知佛像雕造于开元四年（716）四月八日佛诞节。2010年5月，有关部门进行塔体维修时，在二层半处发现壁龛式天宫，出土银质文物22件套，舍利1080颗。其中有一函带有“大唐贞观”铭的《大般涅槃经》银牒经，银板长16.96厘米，宽14.26厘米，文字捶揲于银板之上，共九页，用银丝装订成册，首页经题以及扉页、尾页菩萨、天王像为鎏金。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银牒”条云“牒，札相连也”，银牒经即为银札相连之经书。《法苑珠林》卷十二载祇桓寺有黄金为牒的毗尼藏（律藏），又载迦叶佛时震旦国有人制作“金纸银书”的毗尼律、“银纸金书”的修多罗经（经藏），所谓“金纸”即是以黄金为牒的金牒，“银纸”亦即白银为牒的银牒，“银纸金书”即是银牒上鎏金文字。

“大唐贞观”铭《大般涅槃经》银牒经无疑制作于贞观年间，同出的还有银舍利棺、银舍利塔等银器（图三），其中银舍利塔中有1080颗舍利。关于这些器物纳入塔中的具体年代，现有情况下尚不能坐实就



图三 光善寺出土《大般涅槃经》银牒经与银舍利棺
(取自《光善寺与山东金乡佛教》，《法音》2015年4期)

20) 王佳、李英渠、金舒声：《光善寺与山东金乡佛教》，《法音》 21) 陈垣著：《二十史朔闰表》，中华书局，1962年新1版，93页。2015年4期。

是方志所载光善寺建塔的贞观四年。据冉万里先生研究，以棺椁作为舍利容器始于武则天时期，目前发现最早的金银棺椁舍利容器出土于延载元年（694）建造的甘肃泾川大云寺塔基地宫。²²⁾光善寺塔银舍利棺能否早到太宗时期尚不能确定，又根据上述光善寺塔第三层佛像的造像铭，现阶段还不能否定这些银器是在开元四年（716）纳入塔中的可能性。

北凉县无谶译《大般涅槃经》云：“若欲尊重法身舍利。便应礼敬诸佛塔庙。所以者何。为欲化度诸众生故。亦令众生于我身中起塔庙。想礼拜供养。如是众生以我法身为归依处。”道朗序云：“《大般涅槃经》者，盖是法身之玄堂，正觉之实称，众经之渊镜，万流之宗极。”在塔中埋藏该经应是根据经文的叙述。由此可知，光善寺塔所纳藏的《大般涅槃经》银牒经无疑是法舍利，塔中同时又纳入真身舍利一宗，该塔是集生身、法身供养于一体的舍利塔。

3. 洛阳天堂遗址出土刻经残石

天堂是唐代武则天统治时期所建造的佛教建筑，位于东都洛阳城宫城正殿明堂北侧偏西，遗址在今洛阳市唐宫东路与定鼎北路十字路口东南角。据文献记载，明堂高约294尺，而五级天堂的第三级既可俯瞰明堂，可见天堂的高大雄伟。²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洛阳博物馆曾发掘天堂遗址局部，近年出版了考古发掘报告。据《报告》，天堂遗址二号庭院F1出土一块刻经残石，被重新利用为柱础石。二号庭院与六号建筑同时建造，位于天堂建筑基址之上，天堂焚毁于证圣元年（695），二号庭院约建造于天堂建筑废弃不久。天堂建筑基址还出土一些雕刻石栏板、石螭首等建筑构件以及鎏金小铜花、水晶串珠、小铜铆钉等装饰物品。刻经残石平面略呈长方形，长53厘米，宽45厘米，所刻文字是《法华经·见宝塔品》偈言的部分内容（图四）。²⁴⁾



图四 天堂遗址出土刻经残石局部（取自《报告》72页）

刻经残石应是原天堂所有，其用途是在供养法舍利的同时，也起到标明天堂性质的作用。《法华经·见宝塔品》

开篇言：“尔时佛前有七宝塔，高五百由旬，纵广二百五十由旬，从地踊出住在空中。种种宝物而庄校之，五千栏楯龕室千万，无数幢幡以为严饰，垂宝瓔珞，宝铃万亿而悬其上。四面皆出多摩罗跋栴檀之香，充遍世界。其诸幡盖，以金银琉璃玛瑙真珠玫瑰七宝合成。高至四天王宫、三十三天，雨天曼陀罗华供养宝塔。”武则天建造的所谓天堂应是把经中所讲的七宝塔付诸现实的产物，向世人宣明自己才是居住在须弥山顶、统治三十三天的万能之主。同类的刻经也见于五代吴越国钱弘俶所建的雷峰塔，雷峰塔遗址出土一大批《华严经》、《金刚经》残石，又出土钱弘俶作《华严经跋》残碑。钱弘俶在碑文中云：“塔之成日，又镌《华严》诸经围绕八面，真成不思議劫数、大精进幢。”这些石经原来均镶嵌于雷峰塔

22) 冉万里：《中国古代舍利瘞埋制度研究》，文物出版社，2013年，158-162页。

23) 《唐会要》：明堂“凡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各广三百尺，凡有三层。”《文献通考》：“垂拱四年（688）辛亥明堂成……号万象神宫。又于明堂北起天堂五级，以贮大像，至三级则俯视明堂矣。”《旧唐书·礼仪志》：“时则天又于明堂后造天堂，以安佛像，高百余尺。始起建构，为大风振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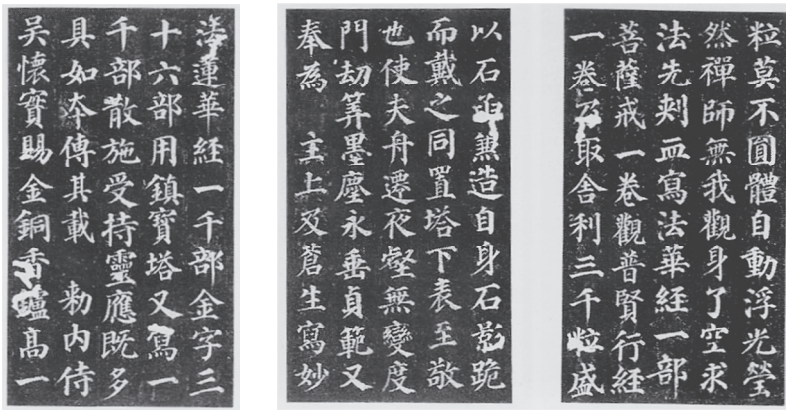
俄又重营，其功未毕。证圣元年（695）正月丙申夜，佛堂灾，延烧明堂，至曙，二堂并尽。”《河南志》：“证圣元年，大明堂、天堂同焚。又敕更造明堂，侷前制……不复造天堂，其所为佛光寺。”参洛阳市文物管理局编著：《洛阳大遗址研究与保护》，文物出版社，2009年，165-166页。

24)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隋唐洛阳城天堂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6年。简称《报告》。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海涛先生惠赐相关资料，谨致感谢。

束腰须弥座的外壁面之上，即所谓“围绕八面”。²⁵⁾ 洛阳天堂遗址所出刻经残石具体装饰在何处不可确知，有可能是装饰在基座外壁上的。

4. 长安千福寺多宝塔埋藏法舍利

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书丹的《多宝塔碑》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建于天宝十一年（752），记载了楚金禅师的简短生平以及他在长安千福寺建造多宝塔的经过。据碑文的记载，楚金禅师九岁落发，继承天台慧思、智者法统，读诵《法华经》，行法华三昧，夜读《法华经·见宝塔品》时，禅定见宝塔，于是誓造宝塔。天宝元年（742）草创时，得到玄宗的大力施助，其后得感应舍利三千余颗，天宝六年（747）于塔内安葬舍利。楚金禅师“先刺血写《法华经》一部、《菩萨戒》一卷、《观普贤行经》一卷，乃取舍利三千粒，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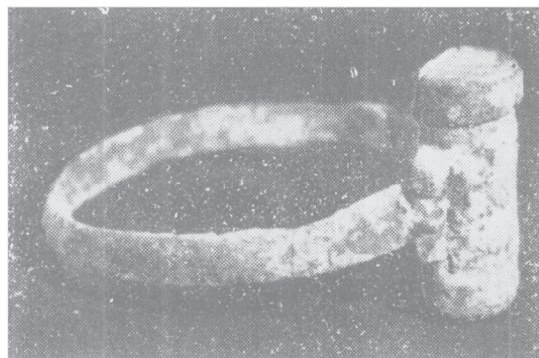
图五 颜真卿书丹《多宝塔碑》拓本相关内容

以石函，兼造自身石影，跪而戴之，同置塔下，表至敬也。使夫舟迁夜壑，无变度门，劫算墨尘，永垂贞范。又奉为主上及苍生写《妙法莲华经》一千部、金字三十六部，用镇宝塔。”（图五）²⁶⁾

由碑文可知，楚金禅师在千福寺多宝塔地宫埋藏血书《法华经》一部、《菩萨戒》一卷、《观普贤行经》一卷以及感应舍利三千颗，同时在天宫内安置《妙法莲华经》一千部、金字经三十六部以镇宝塔，这些经书均是法舍利。楚金是天台宗传人，常年读诵《法华经》。经云：“若自书，若教人书，若以华、香、璎珞、幢幡、缯盖、香油酥灯供养经卷，是人功德无量无边……若经卷所住处，皆应起七宝塔，极令高广严饰，不须复安舍利。所以者何？此中已有如来全身。”经文讲述《法华经》即是全身舍利，塔内安置法舍利后不再需要安置真身舍利。多宝塔中所安置的舍利除作为法舍利的佛经之外，还有三千颗感应舍利以代替真身舍利。

5. 唐墓出土《大随求陀罗尼经》

《大随求陀罗尼经》有宝思惟和不空两个译本，前者约译于武周时期（七世纪末至八世纪初），后者大约译于玄宗天宝年间（八世纪中叶）。据学者统计，唐墓所出土《大随求陀罗尼经》约有六件，多藏于金属臂钏或手镯之内（图六），其中五件出土于都城长安墓葬，另外一件出土于成都唐墓。²⁷⁾ 这种《大随求陀罗尼经》的埋藏方式是来自于经文的规定。据该经的经文记述，把经卷作为护身符放置在臂钏之中或插入发髻随身



图六 唐墓出土藏有经文的鎏金铜臂钏
（取自《文物》1984年7期）

2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雷峰塔遗址》，文物出版社，2005年，40-65页。

26) (唐)颜真卿：《多宝塔碑》，二玄社，1988年，49-54页。

27) 李翎：《〈大随求陀罗尼咒经〉的流行与图像》，严耀中主编：《唐代国家与地域社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349-385页。安家瑶、冯孝堂：《西安沣西出土的唐印本梵文陀罗尼咒》，《考古》1998年5期。李域铮、关双喜：《西安西郊出土唐代手写经咒绢画》，《文物》1984年7期。冯汉骥：《记唐印本陀罗尼咒的发现》，《文物》1957年5期。

携带，可以得到诸天龙神以及一切如来的加护，起到去祸消罪、降魔伏敌、安乐美满等种种现世功德。

三、东亚诸国的法舍利埋藏

隋唐时代的长安、洛阳等地有很多东亚诸国的僧人，也有像鉴真和尚那样直接赴国外传法的情况，所以佛经汉译出来不久，很快就会传到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列岛。从已知情况看，七至九世纪时期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两地刻造石经的情况比较少见，但在塔内埋纳纸本或金、银、铜牒经作为法舍利的现象较为多见。

1. 朝鲜半岛的法舍利埋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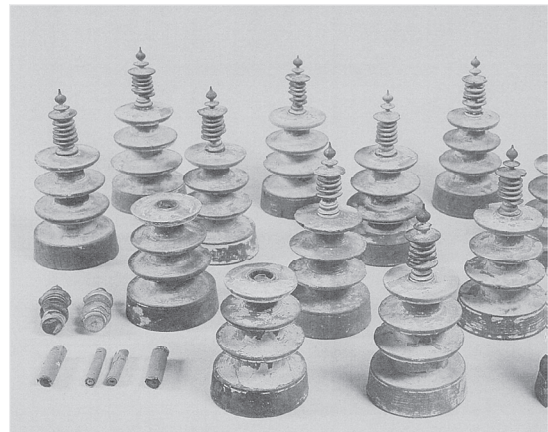
据学者统计，朝鲜半岛较早的法舍利埋藏见于全罗北道益山郡帝释寺木塔，埋纳的是铜版《金刚般若经》，时代在七世纪初（600-640）。其次是682年纳入庆州感恩寺塔的墨书佛经，具体经名不明。至八到九世纪，传庆州皇福寺三层石塔、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奉化西洞里东三层石塔、传大邱桐华寺塔、桐华寺金堂庵西塔及东塔、奉化鹫栖寺三层石塔、庆南海印寺妙吉祥塔等均发现纸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在益山郡王宫里的五层石塔中发现金牒《金刚经》。²⁸⁾《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是武则天统治时期由弥陀山三藏翻译的佛经，经文言“书写此咒九十九本于相轮棠四周安置”，韩国奉化西洞里东三层石塔发现藏有经卷的99基小塔，与经文所言相一致。

2. 日本列岛的法舍利埋藏

据《续日本纪》记载，法舍利埋藏的较早事例是圣武天皇天平十三年（741）下诏在国立寺院七重塔内安置一部金字《金光明最胜王经》（天平十三年二月十四日、十九年十一月七日条）。又据《东大寺要录》记载，天平宝字八年（764）在东大寺东七重塔内安置金字《金光明最胜王经》一部和佛舍利十粒。其它事例尚有天平宝字年间（757-767）圣武天皇的光明皇后在兴福寺五重塔内安置《无垢净光陀罗尼》和盛有一粒佛舍利的水晶小塔。²⁹⁾

此外，称德天皇在宝龟元年（770）发愿制造一百万基木制三重小塔，塔中纳藏《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中的“根本、慈心、相轮、六度等陀罗尼”经卷，分置于各大寺院（《续日本纪》宝龟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条）。现存小木塔平均高21.5厘米，由塔身和相轮两部分构成，相轮之下塔身中央有一圆孔，里面放置经卷。³⁰⁾《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叙述书写安置陀罗尼咒在小塔之中供养，与建造佛舍利塔功德一样，即可“灭一切罪，除一切障，满一切愿”。

如上所述，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在小塔中安置与《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有关经卷是根据经文的规定，这无疑也是法舍利埋藏的一种方式。



图七 百万塔及其纳藏陀罗尼经卷
(取自《研究》彩色图版)

28) 菅野成寛：《日本経塚信仰の起源と源流を探る一韓国調査中間報告と予備的考察一》，《岩手大学平泉文化研究センター一年報》第6号，2018年3月。（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编著：《佛舍利庄严》，翰进印刷，1991年。

29) 参见菅野成寛：《日本経塚信仰の起源と源流を探る一韓国調査中間報告と予備的考察一》（《岩手大学平泉文化研究

センター一年報》第6号，2018年3月）以及同文增补版抽印本（2018年5月）。

30) 增田精美编著：《百万塔陀罗尼の研究—静嘉堂文库所藏本を中心に》，汲古书院，2008年，1-20页，简称《研究》。中根胜编著：《百万塔陀罗尼の研究》，八木书店，1987年，1-17页。

结语

综上所述，北朝以及隋代刻经、藏经大多与末法思想有关，镂之于金石而埋藏起来，其目的是在法灭的时代，保护佛法永久流传。隋末，静琬造房山雷音洞，同时埋藏法舍利和真身舍利，是迄今能够确知的最早的法舍利埋藏，具有重要意义。唐代开始出现在佛塔的天宫和地宫埋藏法舍利的情况，又有在墓葬中墓主随身佩带经书的事例，这些法舍利的埋藏多是根据经文的记述，虽不能否定有护法传法的目的，但追求现世利益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目的。唐代埋藏法舍利的佛塔一般是同时埋藏生身与法身舍利的舍利塔。朝鲜半岛佛可见在塔内埋藏金牒、铜板经书的情况，八到九世纪多在塔内埋藏《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八世纪中期日本列岛开始在塔内安置《金光明经》，之后称德天皇制作小木塔安置《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陀罗尼咒经卷。同一时期的中国古塔内，我们尚未见到有发现《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经卷的报道，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在塔内安置该经卷应是主要根据汉译经书中经文的规定，这无疑也是法舍利埋藏的一种方式。

附记：本文是2018年7月22日在“平泉文化研究会及第二次经塚研究会”（岩手大学平泉文化研究中心与东北大学日本史研究室联合举办）上口头发言的部分内容，会上曾得到菅野成寛（中尊寺佛教文化研究所主任、岩手大学平泉文化研究中心客座教授）等诸位先生的批评指正，在此谨致谢意。

Research on Houshari (法舍利) in the Sui Tang Dynasty

LIU Haiyu

Hoshari(法舍利) represents the concept of the bones of Buddha and is spoken about by Buddha in scriptures and dharana.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relics and literary records, this paper will consider how Hoshari(法舍利) were buried in 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reveal its purpose.